

汉代铜镜与东亚世界

高仓洋彰

(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学科, 日本 福岡 814—8511)

滕铭予译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对汉以及其东方地区铜镜的出土情况进行了讨论, 其中特别指出日本的铜镜出土情况与中国中原地区完全一致, 这已由在日本发现的 400 多枚铜镜所证实, 表明了汉与倭之间存在着不断的交流。在公元 2 世纪有一个随葬铜镜的中断期, 但这个时期恰好是使用破镜和仿制镜的时期, 所以整体使用铜镜的趋势并没有变。由于弥生时代后期的时间跨度与东汉的存续时间相一致, 因此通过日本出土的铜镜可以推测出汉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程度。与之相反, 若要利用铜镜来说明朝鲜半岛南部与汉的交流情况, 从目前的资料看是很勉强的。在这里甚至都看不到存在着一定要使用汉镜的观念。集中出土西汉铜镜的庆尚北道, 并没有在此后的时间里继续下去, 而出土有东汉铜镜和倭镜的庆尚南道, 则突出表现的是韩与倭的交流。

关键词: 汉镜 韩镜 倭镜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1 汉代的铜镜

在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西端的北部九州地区出现的中国铜镜, 主要是带有铭文的文字镜。这种铜镜一般用重圈纹和内向连弧纹等很简单的纹饰作为装饰, 铭文都是篆书体, 多以“絜清白”和“内清质”为开始。在以福岡县为中心的北部九州地区, 一般是一个地区里有一个墓葬集中随葬这些铜镜, 表明这些铜镜是为统治者所有。从西汉王朝传播到东方世界的最早的铜镜, 就是在西汉后期流行的这种花纹装饰比较简单, 以铭文为主体的文字镜。

由于洛阳是东汉都城, 据后汉书记载, 当时这里也是汉与倭和韩的交流地。因此可以把在洛阳烧沟和洛阳西郊汉代墓葬中发现的铜镜作为日本列岛出土铜镜的参考。

可以看出, 西汉后期(包括烧沟二期, 三期前段, 大体上相当于公元前 64 年—公元 6 年之间)的铜镜, 以文字镜为主, 同时包括有内向连弧纹的星云纹镜和四乳四虺镜。其中星云纹镜是从烧沟第一期延续到第二期, 另外两种铜镜是新出现的, 并且成为第三期铜镜的主体。

到了王莽时期, 铜镜的花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花纹变得细致繁缛, 并且是以写实的手法铸出以四神为中心的鸟兽纹, 加上表现神仙思想的隶书体的铭文, 典型的代表就是方格规矩四神镜和细线式的鸟兽纹带镜。

方格规矩四神镜从王莽时期到东汉前期(烧沟的第三期后半到第五期)都有出现。通常是在镜背用细线铸出四神等纹饰, 在较宽的平缘上铸出锯齿纹、波带纹、流云纹和草叶纹等。纹饰可以分为内、外两区, 内区纹饰以细线铸出的兽形为主, 或是四神, 或有其他的鸟兽。这两种铜镜最早均出现于王莽时期。从洛阳地区铜镜的出土情况看, 这两种铜镜可以看作是公元 1 世纪的代表性器物。

另外，从王莽时期到东汉前期，仍然使用西汉时期流行的日光镜和昭明镜。昭明镜在洛阳烧沟从西汉中期一直到东汉初期的墓葬中都有出现，但在形制上发现了一些变化。早期的昭明镜一般在钮的周围饰连珠纹，文字为篆书体，有减字现象，窄平缘，到了王莽至东汉前期时变为圆钮座，铭文多为隶书体，中间往往以“而”作为间隔，减字很多，宽平缘。和昭明镜大体上同时期流行的四乳四虺镜，亦属于西汉铜镜的系统，也一直流行至王莽到东汉初年。

洛阳汉墓的第五期（公元 76—146 年左右），即 1 世纪末到 2 世纪前半，出现了以花纹带为主要纹饰的内向连弧纹镜，这种铜镜因为多在钮座周围铸出“长宜子孙”、“寿如金石”等字样而称之为长宜子孙镜。这是一种全新的装饰风格。这种铜镜在这一时期出土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到东汉中期后则比较普及。这种铜镜的特点是，宽的素平缘，内侧有一圈云雷纹的花纹带和 8 个内向连弧组成的连弧纹，和西汉铜镜相比，其纹饰的表现较为平面化。

长宜子孙内向连弧纹镜的钮座有四叶座、柿蒂纹座和圆形座。柿蒂纹座的铜镜，在柿蒂纹和内向连弧纹之间为无纹的凹平带，纹饰显得更为简化。柿蒂纹座的长宜子孙镜在洛阳烧沟第五期和第六期（2 世纪的后半至 3 世纪初）中比较多见，其中尤第六期为多。到了第六期，柿蒂纹座更加发达，并出现了配以平雕手法的鸟首夔纹的单夔纹镜，亦称为变形四叶夔凤镜。这种铜镜由于钮座周围的柿蒂纹向外伸张而把镜背分为四区，在内向连弧纹和四个柿蒂纹中间各有一个变形夔纹。这种铜镜的进一步发展，把本来装饰钮座的柿蒂纹进一步夸张成如兽首一般，构成了纹饰特别富于变化的夔凤镜。另外在钮的上下，即纵向中心线的方向加上“位至三公”的铭文，左右配以倒 S 状的龙纹，这种镜子多被称为位至三公镜，或者叫双头龙纹镜，也属于夔凤镜系列。

除了以上以平雕的手法表现主题纹饰的铜镜之外，还出现了用浮雕手法表现神兽、动物等主题花纹的平缘半圆方格带神兽镜。因发现了铭文中纪年的这种铜镜，因此可知其流行的时间在东汉建安年间（公元 196—219 年）。在洛阳烧沟汉墓属于东汉晚期的第六期中也出现了这种平缘的神兽镜。还出现了一种飞禽镜，是把钮作成如鸟的身体，并加上头、尾以及翅膀，就像是一支在空中飞翔的鸟。

综上所述，东汉时期的铜镜，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是以用细线刻划纹饰的方格规矩纹镜（王莽到东汉前期）为代表；东汉中期，出现了用平雕的手法表现花纹的四叶纹钮座长宜子孙内向连弧纹镜；东汉后期，则流行以柿蒂纹钮座长宜子孙镜和兽首镜、双头龙纹镜等为代表的，用平雕手法表现花纹的夔凤镜系列，以及以浮雕手法表现花纹的半浮雕式的兽带镜和平缘神兽镜，镜背花纹多样化。

2 日本（弥生时代）的铜镜

日本列岛弥生时代中期的中后段时，在北部九州的瓮棺葬中出现了用汉镜随葬的现象。这是最早传播到日本列岛的中国系器物中的一种。除了弥生时代后期的后段，在日本弥生时代遗址中出现的汉镜，与中国铜镜的发展变化是一致的。因此把日本列岛汉镜的出土情况与中国铜镜的发展变化进行比较，籍此可以了解弥生社会国际交流的一个方面。

弥生时代遗址出土的铜镜中，最早的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多钮细文镜，从弥生时代中期后段开始，出现了汉镜。

弥生时代中期后段的遗址中出土的铜镜全部都是西汉时期的，前原市三云南小路 1 号瓮棺葬和春日市须玖冈本 D 地点的瓮棺葬中都出土了成组的铜镜。这些铜镜中包括一些草叶纹镜、重圈彩画镜等西汉早期甚至更早一些时期流行的铜镜，但大多数的铜镜，如三云南小路 1 号墓出土的 35 枚铜镜中的 29 枚，饭冢市立岩堀田遗址 5 座墓中出土的共 10 枚铜镜，全部都是铭文镜，另外还有一些内向连弧纹的星云纹镜。这一时期传到北部九州地区的西汉

镜，大部分都是直径超过 15 公分的大型镜，而且根据原报告，这些铜镜的质量都优于中国出土的同类铜镜。

弥生时代后期遗址中出土的铜镜都是东汉镜。

大约相当于公元 1 世纪的弥生时代后期前段的遗址中出土的东汉镜，虽然包括有继承了西汉铜镜形制特点的昭明镜，但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被称为王莽镜的方格规矩四神镜和细线式兽带镜。典型的有佐贺县唐津市樱马场的瓮棺葬，以及随葬了 21 枚铜镜的系岛郡井原樋沟瓮棺葬。另外以佐贺县为中心，出现了宽平缘的四乳四虺镜。在福冈市饭氏 7 号瓮棺，出现了内向连弧纹镜，以及在朝鲜半岛仿制的 I 型小型仿制镜，以上这些铜镜构成了弥生时代后期前段的铜镜群。除了朝鲜半岛的仿制镜，其余的铜镜与公元 1 世纪东汉时期铜镜是一致的。

到了弥生时代后期中段，中国镜的数量急剧减少。为什么不用汉镜随葬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可能是由于东汉时期输入的铜镜数量减少了，同时日本列岛内部需要铜镜的层面扩大了。这可以从使用东汉铜镜的破片，以及在北部九州开始制作以内向连弧纹为主的小型镜看出一些线索。也就是说，自弥生时代中期以来大量集中使用铜镜的北部九州地区，那时的铜镜只限于地域社会中的统治者使用，而现在这个使用者的层次开始向下扩展，另外用铜镜随葬的风俗也开始向近畿地方传播，这些都成为对铜镜的需求迅速扩大的一个原因。弥生时代后期中段是出现上述问题并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初期，铜镜的数量不足还引发了东汉铜镜的传世现象。因此，到了弥生时代后期中段以后，日本列岛出土铜镜的变化与中国铜镜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差别。

到了公元 2 世纪后半到 3 世纪前半，也就是弥生时代后期的后半段到终末期，日本列岛出土铜镜的数量又开始增加。

这一时期的铜镜中，有传世的属于东汉早期的细线花纹镜，也有平雕花纹的长宜子孙内向连弧纹镜，以及平雕或浅浮雕怪兽的兽形纹镜，双头龙纹镜，半浮雕式的兽带纹镜等。特别是东汉中期以来出现的长宜子孙内向连弧纹镜和后期的兽首镜系列是这一时期铜镜的代表。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弥生时代的遗址中，没有出现飞禽镜和自东汉晚期到三国时代流行的平缘神兽镜。另外，前原市平原遗址出土的铜镜群虽被认为大体上属于这一时期，但具体时间还难以确定。

除了在北部九州地区（含福冈、佐贺、壹岐和对马）这些铜镜是以完整的形态被使用以外，在其他的遗址中几乎都是被有意的打碎，把破碎面进行打磨后再用于随葬，因此其出土时都是破镜。贺川光夫教授认为这些铜镜破碎以后仍然在使用，所以不能叫破镜，应该叫再生镜，这是值得注意的说法。另外还有些破镜上面有穿孔，从大分县宇佐市本丸遗址出土的破镜的情况看，显然是作为装饰物使用的。

几乎与使用东汉破镜同时，仿制镜的数量急速增加。仿制镜中很少看到有破镜，几乎都是完整的。仿制镜分布的范围与破镜一致，也发现有二者共存的现象，因此仿制镜和破镜的用途应该相同。

破镜和仿制镜的出现，扩大了铜镜的使用范围，石川县金泽市无量寺 B 遗址出土的双头龙纹镜，羽咋市次场遗址出土的四乳四虺镜，富山县中新川郡中小泉遗址出土的仿制镜，群马县藤冈市冢原古坟中出土的仿制镜等，在日本的北陆地方和东部日本的一些遗址中都有发现。这些北部九州以外的地区出土的铜镜几乎都是东汉的破镜和仿制镜，表明了当时铜镜分布范围的急速扩大。

在北部九州使用完整的东汉铜镜的后期，在远远超过西汉铜镜分布东限的大阪市瓜破北

遗址的文化层中，出土了西汉清白镜的残片，这很可能不是偶然出现的残片，而是有意分割成小片来使用。在东汉时期的铜镜中这种例子很多，除北部九州地区比较多的使用完整的铜镜外，其他以九州为中心的几乎所有的西日本地区，都是把铜镜分割成小片，然后对破碎面进行研磨后使用。用这种方法可以增加铜镜的数量，使本来很难得到汉代铜镜的地区也能够使用汉镜。观察完整的铜镜和破镜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使用铜镜范围扩大的背后所表现的是使用铜镜这种观念的向东扩展，这种观念还越过大海传播到了北方。

3 韩国（原三国时代）的铜镜

在研究弥生时代后期遗址中出土的铜镜时，必须要考虑到原三国时代的韩国出土铜镜的情况。韩国出土的铜镜中，属于原三国时代前期（青铜时代）在朝鲜半岛制作的多钮粗纹镜和多钮细纹镜的材料比较多，因此研究也比较充分。同时由于仅在平壤一带的乐浪郡时代遗址中出土有汉镜，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朝鲜半岛南部，几乎没有发现汉镜，因此对于汉镜的研究很少。另外对于模仿中国镜制作的仿制镜的研究，开展得也很少。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大部分仿制镜都不是出于科学的发掘。不过近年由于庆尚北道朝阳洞遗址和庆尚南道茶户里遗址、良洞里遗址的发掘，都出土了很多铜镜，所以也形成了一个对铜镜的专门研究领域。

朝鲜半岛原三国时代出土铜镜的遗址，如果加上青铜时代的出土蟠螭纹镜的全罗北道益山郡王宫面平章里遗址，共有 13 个地点。其中除了平章里和济州道济州市健入洞山地港这两个遗址，其他的全部都在庆尚道。而庆州市一带的庆尚北道，和以金海为中心的庆尚南道这两个地区还有着明显的差别。

庆尚北道发现了以日光镜为主的小型铭文镜为代表的西汉铜镜。典型的例子是庆州市朝阳洞遗址，通过 1979—1981 年的发掘，朝阳洞的墓葬可看出从 I 型、II 型的木棺墓，到 III 型木椁墓的发展，在属于 II 型木棺墓早期阶段的 M38，在人骨的头部和胸部放置了 4 枚铜镜，包括内向连弧纹的日光镜，重圈纹的日光镜，内向连弧纹的家常富贵镜和内向连弧纹的昭明镜各一枚，全部属于西汉时期的铜镜。这个墓除了铜镜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器物，从厚葬现象来看，与北部九州地区的情况相近，但是 M38 位于墓地的一区，这一点与北部九州有所区别。M38 出土的西汉铜镜与北部九州弥生时代中期后段瓮葬棺中随葬的铜镜相同，从遗物的组合以及铜镜的年代看，朝鲜半岛南部也应该处于大致相同的时期。

据《菊隐李养濬蒐集文化财》著录，传出于大邱市池山洞的 6 枚铜镜很值得注意。其中包括 4 枚内向连弧纹日光镜，1 枚重圈纹日光镜，1 枚内向连弧纹昭明镜，全部都是西汉镜。共出的还有装饰在青铜武器鞘上的饰具，剑把头等其他青铜制品。遗物出土状况不详，不过从这个地区很少出土铜镜来看，可以认为这是一组器物。从共出的器物组合，以及日光镜中有两例与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霍贺墓和日本唐津市田岛 6 号瓮棺墓出土的铜镜铭文相同，因此其年代也应在公元前 1 世纪左右。

与此基本同时或稍晚一些的永川郡渔隐洞和大邱市坪里洞两个遗址，各出土了 15 枚（另外还有 2 片破镜）和 6 枚铜镜，二者都伴出有朝鲜半岛公元前后时模仿西汉日光镜制作的仿制镜。

渔隐洞遗址的情况不太清楚，出土了至少 8 件铜钏，2 件带钩，以及各种装饰品等多件青铜制品，可能是一组器物。铜镜中有 3 枚是汉镜，12 枚为韩镜。汉镜中有内向连弧纹镜和四乳四虺镜，素平缘较宽，相当于西汉后期到东汉初期这一阶段。韩镜中有 1 枚内向连弧纹放射线纹镜，1 枚仿内向连弧纹日光镜的仿制镜和 9 枚仿重圈文日光镜的仿制镜，后者属于重圈文日光镜系仿制镜中的 I 型 B 类，还有 1 枚铜镜型制不清，可能也属于后者。

坪里洞遗址出土器物的组合状况不清，该遗址还出土了 3 把细形铜剑，1 件细形铜戈，除了剑把头以外的剑装具，4 件小铜铎等多件青铜制品，以及青铜制和铁制的马具等，同时

共出有 1 枚四乳四虺镜，1 枚仿制的内向连弧纹放射线纹镜，4 枚仿制的重圈文日光镜。

坪里洞遗址与铜镜共出的器物组合与渔隐洞遗址不仅相似，而且重圈文日光镜中还有一枚与渔隐洞遗址出土的镜为同范镜，因此可以推测两个遗址的年代基本同时。与这两枚镜同范的铜镜在日本佐贺县神埼郡二冢山遗址 46 号瓮棺葬中也有出土，瓮棺形式属于弥生时代后期初段，也就是说，从这两个遗址共出的器物 and 铜镜的情况来看，大体相当于北部九州弥生时代中期末到后期前半段，即公元前后。

不过从此以后，在庆尚北道不再出土汉镜和韩镜，表明从多钮镜以来的使用铜镜随葬的现象已经消失。这是由于这一地区因汉文化的影响而迅速汉化，从而使用西汉镜来代替传统的多钮镜随葬，但是多钮镜是凹面镜，而汉镜是凸面镜，在用途上二者并不相同，其结果即导致铜镜的使用中断。

与庆尚北道相比，庆尚南道使用铜镜的情况有所不同。

这一地区最早出现汉镜的是在义昌郡东面茶户里遗址，1988 年第一次发掘的 4 座墓中的 1 号木棺墓中，出土了 1 枚西汉内向连弧纹镜。用于埋葬的以整块木头剖制成的木棺保存完好，棺的周围随葬有素面的环首铁刀，大量的工具、农具，以及豆和弓等漆器。在木棺下面挖的土坑中放置的竹笼里，出土有铜镜，以及 3 件装在黑漆木制鞘中的细形铜剑，还有铁剑、铁戈、西汉五铢、小铜铎、有黑漆轴的笔等遗物，大量的遗物都保留着原来埋藏时的状态。如果再加上棺内的遗物一定会更丰富。这个墓与朝阳洞 38 号木棺墓一样，也是在一个墓群中的一个厚葬墓，年代大体上相当于公元前 1 世纪的后半。

年代上稍晚的例子，是 1969 年发掘的出土了一枚方格规矩四神镜的金海郡酒村良洞里遗址的土坟墓。铜镜是王莽到东汉时期的代表性器物，还共出有 1 件铜制的剑首，2 件铁剑，2 件铁矛，以及 3 件陶器。方格规矩四神镜与铁制武器的组合，在北部九州是属于弥生时代后期初到前半段。

可是接下来的时期，庆尚南道没有见到有铜镜出土。到了公元 2 世纪以后，再次出现汉镜，应引起注意的是同时还有大量的倭镜。因此在前面提到庆尚南道的茶户里和良洞里两个公元前后的遗址中发现的两枚汉镜，和公元 2 世纪以后出土的铜镜并不是同一个系统，应该是庆尚北道随葬铜镜系统的扩展所至。

庆尚南道公元 2 世纪以后出土铜镜的例子，是在固城郡固城面东外洞贝丘遗址中与细形铜剑的铜制剑具和宽形铜矛共出的 1 件汉镜的破片，从仅存的内区花纹的特征看，应该属于东汉时期的细线式兽带纹镜，被认为是使用后废弃的。国立光州博物馆的李健茂见告，在韩国未发表的出土资料中还有一些残破的镜片，东外洞的破镜片与北部九州出土的破镜片在性质上可能相似。虽然不能明确东外洞遗址的年代，但如果共出的器物组合是正确的话，那么根据在对马发现的木坂箱式石棺墓的例子，还有在日本的一些居址中也出土很多的破镜片来看，东外洞遗址的年代大体上相当于弥生时代后期后半到终末期，即 2 世纪后半或稍晚。

庆尚南道也出土有北部九州生产的倭镜，属于笔者对倭镜分类中的仿内向连弧纹日光镜的仿制镜中第 II 型 a, b 类，不能排除在朝鲜半岛也有生产同样镜子的可能性，但在北部九州发现过 a, b 类铜镜的铸范，而且在佐贺县砾石遗址发现了同范镜，因此这些铜镜很可能是在日本生产后传播到庆尚南道的。目前已经知道金海郡酒村良洞里遗址、咸安郡伽倻面沙内里、济州道济州市健入洞山地港遗址各出土 1 枚倭镜，另外《菊隐李养璿蒐集文化财》也发表有 3 枚倭镜。山地港遗址并不属于庆尚南道，可以看作是庆尚南道的扩展地区。另外近年在良洞里遗址的发掘调查，其中的 162 号木棺墓中出土了 2 枚东汉镜和 8 枚仿制镜。这些资料都还没有发表，实物也只见到 1 件，其他的根据照片来看，仿制镜都属于内向连弧纹日光镜系列仿制镜中第 II 型的 a, b 类，东汉镜是前期不曾见到的长宜子孙内向连弧纹镜和禽兽带纹

镜系列，从该墓的组合看，年代最早也应在公元 2 世纪后段。综上可知在朝鲜半岛南部出土倭镜的同时，出土的东汉镜种类有所增加。

这样在庆尚南道发现的属于公元 2 世纪后半段以后的铜镜，包括有倭镜和东汉铜镜的破片，这与北部九州使用铜镜的情况基本一致。

如上所述，从朝鲜半岛南部出土的铜镜来看，数量少且集中于庆尚道。初期都分布在庆尚北道一带，用仿制镜来弥补西汉铜镜的不足。此后既使到了三国时代，这个地区都没有表现出对铜镜的特殊兴趣。相反在原属于狗邪韩国故地的庆尚南道的金海地区以及其周边地区接受了铜镜。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倭镜数量要比东汉铜镜多。如果东外洞的镜片可以看作是破镜的话，那么很可能是接受了北部九州地区的使用方法。倭镜的制作地点是奴国，从分布地点看，狗邪韩国是距离奴国最近的一个邻国。在日本列岛发现了很多的韩系遗物，而在朝鲜半岛南部也从北部九州传来了一些与铜镜使用有关的习俗，其中东汉镜的来源很可能也是来自北部九州，从这些情况看，可以认为当时两地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总之，朝鲜半岛并不是一个必须要使用铜镜（汉以及其仿制镜）的社会，在这一点上与公元 2 世纪后叶以后的北部九州以及日本列岛是有显著区别的。

4 乐浪郡的铜镜

最后，根据高久健二先生最近关于乐浪墓葬的研究（《乐浪墓葬的编年》，《考古学杂志》；1993 年 78—4），来看乐浪郡出土铜镜的状况。

根据高久先生的研究，乐浪郡墓葬随葬的铜镜有如下的发展变化。

乐浪一期，公元前 2 世纪末到公元前 1 世纪前半，细地文镜，星云镜。

乐浪二期，公元前 1 世纪后半，铭文镜。

乐浪三期，公元 1 世纪，铭文镜，方格规矩镜，内向连弧纹镜，细线式兽带纹镜。

乐浪四期，公元 2 世纪，内向连弧纹镜，盘龙镜，四乳涡纹镜。

乐浪五期，公元 3 世纪前半，内向连弧纹镜，半浮雕式兽带纹镜，求心式神兽镜，斜缘二神二兽镜。

把乐浪墓葬随葬铜镜的发展变化与中国中原地区进行比较，乐浪一期相当于洛阳烧沟汉墓一期，乐浪二期相当于洛阳烧沟第二期和第三期前段，乐浪三期相当于洛阳烧沟第三期后段和第四期，乐浪四期相当于洛阳烧沟第五期和第六期，乐浪五期相当于洛阳烧沟第六期末。如果考虑到乐浪墓葬中出土铜镜的种类，发展变化的轨迹，以及各期占主体地位的铜镜，都与中原地区的变化相一致，因此乐浪郡可以看做是隶属于汉中央政府的边郡或驻外机构。

以上，对汉以及其东方地区铜镜的出土情况进行了讨论，其中特别指出日本的铜镜出土情况与中国中原地区完全一致，这已由在日本发现的 400 多枚铜镜所证实，表明了汉与倭之间存在着不断的交流。在公元 2 世纪有一个随葬铜镜的中断期，但这个时期恰好是使用破镜和仿制镜的时期，所以整体的趋势并没有变。由于弥生时代后期的时间跨度与东汉的存续时间相一致，因此通过日本出土的铜镜可以推测出汉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程度。

与之相反，若要利用铜镜来说明朝鲜半岛南部与汉的交流情况，从目前的资料看是很勉强的。在这里甚至都看不到存在着一定要使用汉镜的观念。集中出土西汉铜镜的庆尚北道，并没有在此后的时间里继续下去，而出土有东汉铜镜和倭镜的庆尚南道，则突出表现的是韩与倭的交流。

5 倭使到长安(西汉), 洛阳(东汉)的交通路线

汉镜是通过怎样的一条路线传播到日本? 由于资料所限, 对于这个问题以前从来都没有考虑过。

仅有的一点线索是《三国志》和《汉书》, 也就是《魏志》中的倭人传记载, 带方郡太守派使节护送倭人到当时的都城洛阳。那么在带方郡从乐浪郡中分出来之前, 应该是乐浪郡的使节负责护送倭使去洛阳。

以下几个线索可以推测当时他们是通过什么路线从朝鲜半岛到洛阳。

线索一, 公元前 128 年, 位于现在北部朝鲜的日本海一侧的土著部族的首领(秽君)南闾, 率领住民 28 万人, 向西汉中央政府提出臣服, 西汉政府接受并在所在地设苍海郡。但是苍海郡只有两年就废止了。废止的理由是, 在设置郡县时, 西汉政府没有能够修通苍海郡与邻接的郡县之间必须要修建的官道。未能修建官道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汉政府为了能够征服以现在广州为中心的南越国而征讨西南夷, 从而带来庞大的军费开支, 没有经济能力为苍海郡修建官道。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当时在郡县与郡县之间, 有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官道。这些官道都是以最短的路线通过县城修建的。

因此在乐浪郡、带方郡和都城(长安和洛阳)之间也一定有官道存在, 同时由于是由郡县的官员带领倭使到都城去, 因此选择的路线一定也是官道。

线索二, 虽然没有充分的资料, 但前辈学者对唐代官道的复原研究, 可以作为参考。

从当时唐的都城长安, 到离东夷地区最近的安东都护府(现在的沈阳)的路线是:

第一步, 从西安到洛阳;

第二步, 从洛阳到北京, 当时把这条路称为大官道;

第三步, 从北京经绥中到朝阳, 当时把这条路线称为卢龙道;

第四步, 从朝阳到沈阳, 当时把这条路线称为辽东道。

线索三, 公元 663 年, 在韩国的扶余一带进行的日本/百济军与唐/新罗之间的白村江战役时, 唐朝军队是通过海路和被称为“乐浪道”的陆路进军的。乐浪郡在公元 313 年已经废止不存在了, 之所还存在有乐浪道, 很可能是保存了原来的道路。这个乐浪道应该就是当时乐浪郡、带方郡与其相邻的辽东郡相联接的官道。

从唐代的大官道到乐浪道所经过的地点, 都是汉、魏时期郡治或县城的所在地。

不过, 汉代的辽东郡郡治并不在今天的沈阳, 一般认为是在现辽阳一带, 还有在北京东部设置的汉代渔阳郡的郡治可能在北京市的怀柔, 唐代的大官道没有通过这两个地点, 可能是由于当时已经修建了长城, 官道沿着长城修建, 因此绕过了以上地点。

同时这条官道的路线, 是从现在的绥中到秦皇岛, 再到北京, 再到洛阳, 大体上与现在的铁路线相同, 只有辽阳和绥中之间有较大的变化, 是经过广宁到义县, 再到朝阳, 再到辽阳, 然后到凌源这样一条路线。只有根据考古资料, 努力确认这些郡治和县城的位置, 才可能证实上述推测的可靠性。

Takakura Hiroaki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unearthed situation of bronze mirrors of Han and its eastern areas, especially points out that the bronze mirror's unearthed situation of Japan are totally unanimous with that of China Central Plains area, which has been already verified by 400 pieces bronze mirrors of Japan, and indicates the constan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Han and Japan. There is a piece of cutting off for period with burying the bronze mirrors in the 2nd century, but it happens to be the period using the broken mirror and modeling the mirror in this period, So the whole trend of using the bronze mirror has not changed. Because it is compatible with storing and continue tim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fill the time span of growing era later stage, Infer and produce Chinese culture degree of impact on Japan's archipelago through Japan unearthed bronze mirror. Contrary to it, if should make use of bronze mirror to explain the south of Korea peninsula and the man's exchange situation, Seen from present materials been very reluctant. In here see and have and use Chinese the ideas of mirror even. Centralized and unearthed Xihan celebrate north ways still by bronze mirror, have during the time after this continuing, Unearthed to have and at to it celebrates to be still southern ways mirror, then outstanding behaviors Korea. And at interchange bronze mirror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Mirror of Han Dynasty; Mirror of Korea; Mirror of Japan; Cultural Exchanges

收稿日期: 2004-06-10

作者简介: 高仓洋彰 (1943-), 男, 日本福冈县人, 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学科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日本弥生时代考古, 东北亚考古学研究。